

第一章 寻找古老而原始的游踪

朦胧难觅的史前社会、原始人的游踪 已被沧海桑田深深淹埋着。虽岁月渺茫 陈迹难辨 人迹难寻 但“人猿相揖别”(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人的进化、智慧的积淀 终于揭开了人类历史前夜的密码。

人们常把地球比作一部巨大的历史书 遗留在岩层土壤里古生物的遗骸与遗迹,就是记录地球上生命演化的密码。密码的破译便揭开了地球上生命和行迹的秘密。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 劳动则是促成这一转化的决定因素。这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展示了人类游踪的发展规律。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戏剧台词说:人类是地球上有机生命历经漫长进化过程产生出来的“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即《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 惟人万物之灵”。人猿相揖别 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行迹的开始。因此,我们将人类行迹的开始作为中国旅游史的开端。原始人的游踪,首先是在人的进化过程及其活动范围内普遍进行的,而且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生存活动区即是景区。

第一节 由史而寻迹

一、人猿相揖别

中华民族栖息繁衍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北半球东亚大陆。这里领域广大 腹地纵深 回旋天地开阔 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的地球环境，是其他民族发祥地难以具备的条件，也是原始游踪广阔而丰富的基本条件。因此，中华民族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都留下了原始的游踪。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祖先。1965年5月，我国学者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元谋猿人，这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而本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又从云南禄丰县发掘出土3个腊玛猿头骨、2个西瓦猿头骨以及9个下颌骨、1000多颗牙齿等，证实我国也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从而使西方学者认为“人类起源的钥匙”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这种古猿已迈开了生物进化链中关键的一步——向人转变。它们直立行走，前后肢开始分工，会使用天然工具来获取食物，却不会制造工具。能否制造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古猿下地直立行走也是“人猿相揖别”的关键转变。而且从“旅游”来说，古猿不再是“爬行”而是“行走”了。

古猿下地后，历经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进化过程，直到距今二三百万年前，才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质变，学会了制造工具，称之为猿人。猿人使用和制造的工具主要是用石头打制成的。这个时期在考古学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此后，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又用天然石头磨制成劳动生产的工具，这个时期在考古学上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合称为“石器时代”，它相当于历

史上的原始社会时期。

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主要分布在祖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地。其最早的代表是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元谋人”在 170 万年前就出现在祖国的土地上。再晚一些的是陕西省蓝田县泄湖镇陈家窝村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有 80 万年。较蓝田人更晚的是北京西南郊周口店龙骨山石灰岩洞里发现的“北京人”距今约 50 万年至 60 万年。

元谋猿人生活在冰川活动时期 经受了冰川的严峻考验 并在同严寒作顽强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用自然火的人类。元谋人一经掌握了火 就用火照明、御寒 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因为有了火 在洞口燃烧起一堆火 就不怕野兽的侵犯 就可以腾出更多的人力去从事生产活动，从而产生战胜“敌人”支配生产活动的奋进力量。因为有了火，还可以熟食猎物，缩短消化过程 增加人体营养 大大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

蓝田猿人比元谋猿人更聪明，制造的石器工具在类型上已有了一定的分工，在打制石片和修制石器上显示出具有某种程序和方法的迹象。北京猿人则更加进步，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极其艰苦的生产斗争中不断地突破旧的经验，提高劳动的本领，逐渐懂得选择较多较好的原料，打出更加适用、更加规整的石器，除刮削器、砍伐器外 还有少量的尖状器、斧状器和两端刃器等。

二、从原始人群到母系氏族社会

在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中 在“人猿相揖别”的漫长岁月中 猿人们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生活在原始人群里。他们一般几十人结成一个群体 在一起制造工具 保存火种 抵御野兽 猎取食物。共同的劳动要求他们必须结合成“群体”群体的合作才能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保证个人的生存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劳动经验的不断创新。

原始人群居住和生活的地点是极不稳定的。自然条件一发生变化,就要被迫集体转移。在秦岭地区南北的蓝田猿人和郧县和郧西猿人的生活环境,气候温和湿润,既有茂密的亚热带森林,又有广袤的草原 还有猕猴、虎、象、猿、野猪、毛冠鹿和水鹿等森林性动物 马、牛、羊、羚羊等草原动物。而生活在南方元谋盆地的元谋人是处在冰川活动的环境中。所以,蓝田猿人、郧县和郧西猿人的原始人群较元谋猿人时期有所扩大。北京猿人居住的地方,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茂密的原始森林,西面和西南是丘陵起伏的灌木丛林,东南方是广阔的草原。这里的气候先是比较寒冷,后来变得温暖而湿润,十分有利于采集和狩猎生活。

原始人群的两性关系是杂乱的“血缘”家庭,还不可能有两性结合的任何规定。在社会相互关系上,也只能实行原始的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平等关系。《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 其民聚生群处 知母不知父 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无上下长幼之道 无进退之礼。”这就是原始人群的生活情况。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斗争中,依靠人类自觉的能动性逐步扩大了社会生活的领域,推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巨轮。

猿人经过“古人”阶段的过渡 便进入“新人”阶段。古人时代距今大约有 20万年~30万年。他们可以说是一支正在成长中的猎人 可能已发明了用石头制作的“投石索”和“投枪”。工具的改进使采集和狩猎的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加之体质形态较猿人更接近于现代人,按年龄和性别之间的自然劳动分工也有了发展,其社会形态也发生变化 由“猿人”乱婚过渡到按辈份区分的“血缘婚姻”,从而产生当时社会的组织基础——“血缘家庭”。

距今四五万年时 古人进化到“新人”阶段 氏族制度确立。这时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晚期。从新人的体质形态看,已根本摆脱猿人的原始性质而同于现代人。就世界范围来说,这一时期的人已经散布到全球各大洲。由于光照、温度和湿度等因素的长期影

响，加上相对隔绝等原因，形成了不同肤色、发型和鼻宽等特征的黄色、黑色和白色人种，即一般人所说的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欧罗巴人种。

新人使用的劳动工具虽然仍是木、石和骨器，但制造方法和技术更为先进了。石器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多，类型明显，形式对称均匀，刃部锋利适用。更显著的进步是除砍砸、尖状、刮削器等细石器外，还出现了各种雕刻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细石器。石镞的出现，证明新人已发明了弓箭或标枪。在骨器的制造上，已开始运用磨制技术。骨针和骨锥出现，说明新人已会用兽皮缝制衣服，从此，人类结束了赤身露体的时代。在用火上，新人已脱离了保存天然火种的阶段，发明了摩擦生火的技术，使火能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

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远古祖先——新人，已开始制造装饰品来美化自己，有了美的意识，有了最早的工艺品，如山顶洞人的钻孔小石珠、黄绿色砾石、鱼骨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及刻有沟槽的骨管等等。

新人与古人虽然都是过着狩猎、采集和捞渔的生活，但氏族内部各成员已有了按性别和年龄区分的简单分工。青壮年男子从事狩猎、捞渔和防御猛兽。妇女从事采集劳动和烧烤食物，加工兽皮缝制衣服，照看老幼、住所等繁重的社会劳动。老人和儿童也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妇女从事的采集经济比男子的狩猎经济具有较稳定的性质，是比较可靠的生活来源。由于妇女所从事的劳动对维系氏族的生存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妇女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氏族的重要成员，并受到普遍尊敬，成为氏族的主持者和领导者，这就是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

新人的氏族公社已排除了古人的“血缘婚姻”而实行“族外婚”，即一氏族的一群兄弟与另一氏族的一群姐妹交互群婚，氏族

内不得通婚。由于男子外婚到另一氏族建立“对偶家庭”死后归葬在本氏族墓地，其子女往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氏族成员的世系也只能按母系血缘来计算。同一始祖母生下的若干后代组成一个氏族公社，公社扩大后分离出来另立新氏族，几个氏族组成胞族或部落。由此可见妇女对维系氏族的繁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母系氏族社会进一步发展、繁荣，出现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磨制石器，人类的体质形态已完全和现代人一样，我国的原始社会又向前发展，进入了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为标志，距今 7000 年 ~4000 多年。

随着采集经济的发展，氏族成员创造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开始“刀耕火种”，人工栽培农作物，饲养牛、羊、马、鸡。同时，随着新石器磨制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工具的明确分工，以及农作物收获量的增多与稳定，我们的祖先便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人们已从潮湿的山洞搬进半地穴或平地建造草泥敷作的房屋。屋内抹上草拌的泥，建成一个既遮风雨又温暖干燥的“家”，为日后的园圃、苑囿、村落打下基础。

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原始的手工业，如纺织麻布，编织席子、渔网和制作陶器。陶器的出现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标志。原始的制陶工作由有经验的妇女承担。发展到仰韶文化时，制陶技术已相当成熟，尤以红陶和彩陶最有名。纺织和缝纫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除鞣软的皮革外，还发明了原始麻织物。装饰品的制作，虽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但这时无论在种类、数量、精巧上都为往昔所不能比拟。

三、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代，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个氏族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以妇女为中心的血缘纽带以及共同的劳动把每个成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一个氏族名称下，组成一个整

体，保持着一个共同的世系，藉以区分于别的氏族。每个氏族采用一种生物或非生物作为氏族徽号或标记，叫做“图腾”。氏族所有的财产，如土地、房屋、家畜及一切生产工具、资料和成果等都是公有的。妇女是氏族生产活动和财产的主持者。在氏族里不存在统治与奴役现象，没有暴力统治和特权人物。每个氏族、胞族和部落的首领由群众集会选举产生。这种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通常都在公共的“大房子里”进行。它是当时最高的权力机关。所谓“神农于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汜论训》）；“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就是用“风俗统治”（列宁：《论国家》）即传统习惯来约束群众，充分体现了氏族公社的平等与民主精神。

从氏族到胞族，从胞族到部落，社会机构不断扩大，首领的地位越来越高。按女系确定血统、继承权和社会组织，使妇女受到尊敬，成为氏族一切活动的主持人。在母权氏族公社，首领一般由妇女担任，或由勤劳勇敢、办事能力强、有一定群众威望的男子担任。不存在男女不平等和奴役，一切纷争都由当事人的集体——氏族或部落解决，血亲间的复仇是极少用的手段。但这并不是说母权制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生产力的低下、生活条件的艰难，使人类的寿命很短，一般只有 30 岁～35 岁左右。同时，在母权制繁荣阶段，母系大家庭出现后，就给氏族内部渗进了离心因素。各个大家族具有各自的经济生活，在氏族的共同利益内部，滋长着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并逐渐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样的家族很自然地重新考虑调整两性分工，将男子投入强劳动中去，于是，男子在生产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逐步居于主要地位，从而就要求改变以母系为中心的继承关系。

从母权制公社到父权制公社，造成这个历史性转变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距今约 4500 年前左右，我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一些母系氏族公社先后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原来那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

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连同它的氏族部落会议和民主选举制度，一直延续保留下来，集体共有仍是管理社会的最高原则。但男性在各方面获得了支配权，开始男婚女嫁。原来不很巩固的对偶家庭开始转变成一夫一妻制家庭，原则上要求独占同居。女子外婚后，必须转到夫方居住，主要担负家务劳动，成为夫方固定的家族成员，死后也不归葬本氏族。在当时，一夫一妻制小家庭还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还包括在父系大家族中。父系在家族的主要成员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及其个体小家组成。父权制公社是按男系确定血统和继承权，从氏族到部落各级的首领，由父系大族长们承担。父系氏族公社的成员则由始祖父以下的各代兄弟群及其子女组成。女子外婚后就加入夫方血统氏族，不再属于父亲氏族。

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的增长、剩余劳动的出现、家庭奴隶的产生，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日益增多、财产分化和家庭私有进一步滋长、掠夺奴隶与财富战争的频繁，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开始萌芽。于是，父系大家族和氏族公社内部的民主、平等生活日渐消失，并日益由私人意志所代替，它就面临全面解体的命运，向着阶级社会过渡。

黄帝时代，在历史上处于父系氏族公社经济发展时期。这时，产品开始出现剩余，农业、手工业走向分工，原始的交换行为开始了，所谓“祝融作市”，“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晋语》）。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多余产品开始进行直接交换，于是就出现了货币。在原始社会末期，牲畜、粮食、布、帛都充当过货币的材料。同时，因掠夺奴隶和财富而爆发的战争的需要，在氏族社会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联盟。尧、舜、禹等是部落联盟中著名的领袖。部落首领由经部落联盟会议推戴，但被推选的人物已逐步缩小在若干显贵家族中，并由“禅让”转向传子。

第二节 由人而寻迹

所谓“旅游”指人们离家外出旅行，以求娱乐、审美和求知，具有运动、文化、经济三大特点。中国古代旅游由运动性开始，向文化性和经济性、政治性、娱乐性综合发展。

伟大、壮阔、美丽的神州大地，不仅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而且是人类旅游发祥圣地。“人猿相揖别”，古猿走出森林，在地面上直立行走，便开始攀登高山峻岭，涉渡江河流溪，穿越莽莽林海，开始几百万年的生存之旅。他们迫于生存，在森林、群山和旷野中的奔波、流浪，虽不是流连和欣赏美景的旅游，而是为生存所作的行路，却具有旅游的运动性——行的开始。它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认识世界、开发自然的最初途径，也是人类创造具有审美、愉悦意识的旅游的发端。

一、依山林为命之“游”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自然辩证法·导言》）元谋猿人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历史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国旅游史的序幕。

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超越自然，能够认识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所以，《列子·汤问》说：“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从此，地球及其周围的空间变成熙熙攘攘、充满生机的“人的世界”。人类通过几百万年劳动生活形成和发展了别的生物所缺少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仅接受自然的选择，而且用意识和劳动去选择自然。也就是说，人类主要不是依赖身体器官的变异消极地顺应自然环境，而始终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地革新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来积极地增进对自然的制驭力，并不断地发展自身的智能，由自然环境

的奴隶变成主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从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化石的发现，到近几十年辽宁赤峰红山文化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 100 多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并留下了漫漫长路的“旅游”足迹。

“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3 期）同样，面对自然的严峻挑战和各种猛兽虫害的袭击，个人的力量是极其微弱的，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维护各自的生存。中华先民“聚生群处”几十人，或者几百人，聚成“群”，结成社会，用超出一般动物的智慧，去顺应自然、利用自然、驾驭自然，去“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年复年辗转于山林原野，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享用。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的降临、毒蛇猛兽的侵袭，或者可供生存食物的减少，原始人群必须到处奔波流浪，过着行迹不定、留居不定的生活。

在随处而寓、随时起行的集体采集、共同渔猎的行程中，每一次胜利或失败都给生存之旅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欢乐或悲伤。有时候，当他们步履所及是硕果累累的野果林、渔猎丰富的山泽、气候温暖的环境，便欣喜若狂，立即选择方便、安全的场地，宽敞、高亢干燥的洞穴，留居下来，过上一段较安稳的日子。白天妇女留在留居地附近，或者照料留在山洞内外的老弱病幼者，或者管理食物、保留火种，或者去洞穴周围采集野果、野菜，年轻力壮的男子则去较远的山林捕杀野物和捞渔。傍晚时，劳作一天的男女返回暂居的“宿营地”，引燃篝火，烤煮猎物，共同享用。他们交谈行程中的惊险艰苦、耳闻亲见的奇事异物，共享欢乐，同庆胜利，相互交流经验，商讨翌日的行程，交待新的任务，最后带着劳作后的疲倦和胜

利者的欢笑而进入美好的梦境。这种为生存而进行的奔波之旅、流浪之旅，虽不是真正的旅行或旅游，其中却包含行路过程中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懊丧和明天的希望，具有旅游或旅行的发轫意义，是原始人从生存斗争中引发出来的旅行或旅游的原始模式，揭开了中国旅游史的序幕，也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开端。

为生存而进行的奔波之旅往往受大自然的支配，而不受“古人”意志支配。他们与大自然抗争的办法是“走”。不断地、盲目的迁徙是生存旅游的特点。气候的变化、森林的燃烧、地震发生、火山喷发、山洪暴发等等，都是原始人群无法抵抗的。他们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迁徙到别处去生活。例如，距今 70 万年前的秦岭北坡，原来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森林茂密，是一派亚热带的风光，后来受第 4 世纪冰川活动影响，这里的暖色调变成了冷色调。居住在这里的蓝田人只好远走高飞。

二、神秘的“游踪”

史前社会是一个漫长而无文字记载的社会。当时人类生活的情况，只能靠口耳相传，无不带上神秘的色彩，一旦剔去神秘的色彩，其原貌就显示在我们面前，旅游也是如此。

伏羲和女娲兄妹婚配可以说是人类为生存、繁衍而进行的一次神秘“旅游”。据说那时在祖国大地的南方发生了特大洪水，人们全被淹死了，只留下东山“老人”和南山“小妹”俩，大地死一般沉静。他俩依靠自己的劳动，依然愉快生活着，哥哥和妹妹还常常手挽手，从“天梯”上攀登到“天庭”去游玩。但人类需要繁衍后代，打破大地的寂静，于是同胞兄妹就结合了，所以，现在的人都是他俩的后代。根据湖南瑶族古歌《发习冬奶》，伏羲追女娲婚配，还进行了一次极有趣的“追赶”之旅。哥哥追妹妹，从“日出追到日西落”，“绕了一天没追着”。后来是乌龟献计，教哥哥突然转身迎面拦截，妹妹就落入哥哥怀抱。

伏羲，一作宓戏，乃华胥氏之子。即“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戏”（《太平御览》，《诗含神雾》），华胥氏因到东方林木蓊翳、风景美好的雷泽去游玩，才见大足印而履之，可见伏羲诞生与“旅游”有关。伏羲女娲婚配，不仅与“旅游”有关，而且是在“追逐”中进行的“旅游”。旅途中有山、水、树、竹等景物。至于那登天的“梯子”，一是指常人无法攀登的昆仑、华山青水之东的崆峒山、西方荒野的登葆山；二是指树木，如建木、三桑、寻木、扶桑和若木等。伏羲、女娲和仙人柏高经常上下“天梯”去游玩。

伏羲对人类作出很大贡献。《周易·系辞下传》曰：“包牺（即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潜夫论·五德志》又说伏羲“结绳为网以渔”。无论是画八卦，将三（乾）、三（坤）、三（坎）、三（离）、三（艮）、三（震）、三（巽）、三（兑）符号，代表天、地、水、火、山、雷、风、泽等天地万物，还是教民编网捕鱼鸟，都是伏羲“旅游”生活中看到、听到、实践过的经验总结，尤其是仰望天空、俯察山水画八卦，“契木为文（纹）”以记事，没有长期在大自然中“遨游”的生活是无法创造的。

人类用火、发明取火方法，也与人类最初的“旅游”有关。《白虎通·号》说：“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最早的原始人类不知熟食，处于所谓“茹毛饮血”时代。传说伏羲是雷神的儿子，他首先发现被火烤熟的兽肉可口美食，便从山林里携带天然雷火烤熟食物，但不知如何取火。后来有一智者，漫游天下，到了“遂明国”，受鸛鸟啄遂木而发出火花的启发，回去后，便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这个智者被称作“燧人”，即“取火者”。因此，人类在生存“旅游”的跋涉中，长期反复观察了大自然的雷电或火山爆发导致森林大火，才知道火可以取暖，吓跑野兽，被烤熟的食物特别香喷可口。于是，人们才会利用和保存自然火，才去探索和发明取火方法。还有“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磽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辟就”的神农氏（《淮南子·

修务训》)也是历经多少步履才悟出其中道理的。

“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览冥篇》)女娲为寻找补天的方法和材料，曾走过 9999 座山，蹚过 9999 条河，进行了艰苦的跋涉。“旅游”来到昆仑山才找到五色石，炼好岩浆补好了天。一不小心装岩浆的大钵子掉到洞庭湖里，形成了湖中之岛——君山，而飘落的岩浆则形成了骊山温泉。

史前的“旅游”虽然依据神话传说，无不带上“神秘”的色彩，但神话是历史的影子。世界文坛巨匠高尔基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应。”(《苏联的文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因此，神话反映了自然现象以及与自然斗争的情况和社会生活情景，神话对科学有启迪之功。同时，史前的“旅游”就是行路、开创步履。我们的祖先在自然条件的压抑下，在改造环境和创造生活中迈出了坚定的步履。女娲为“补天”而去行路，寻找五色石，有巢氏为使“民悦之”去行路，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韩非子·五蠹》)；燧人氏为取火而去行路，发明了钻木取火，伏羲为繁衍人类而去行路，“教民嫁娶”；神农氏为繁荣农业生产而去行路，开创新生活。因此，史前的“旅游”(即行路)就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就是开发和改造自然，开创新生活。

三、黄帝之神游与“祖神”

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一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伟大人物。“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

五帝本纪第一》。他一生不离群山，好与野兽为伍，喜入名山之游，也是一位旅游文化的伟大倡导者和播种者。神州大地探幽历险即始于黄帝。

黄帝战胜蚩尤后，曾“使风后负书，常伯荷剑，旦游涓流，夕归阴浦，行万里而一息。流如沙尘，足践则陷，其深难测。大风吹沙如雾，中多神龙鱼鳖，皆能飞翔。有石渠青色，坚而甚轻，从风靡靡，复其波上，一茎百叶，千年一花。”（王嘉《拾遗记》卷一）据说黄帝在昆仑山上筑有十分华美庄严的行宫，专供游乐和旅游时居住。葛洪在《抱朴子·地真篇》中说：“黄帝喜欢到各地去旅行。青邱、洞庭、峨眉、王屋山等，都有他的游踪。今河南新安县‘青要之山，实维帝之密都’；昆仑之丘，实维帝之下都”；“槐江之山，实维帝之平圃”。平圃即“悬圃”，系黄帝在下方的一座最大的花园，风景十分壮观。从这里向西南 200 公里即昆仑山，夜晚隐约可见黄帝行宫闪耀的光亮，向西可见被郁葱茂绿树木环绕的“稷泽”，这是周民族始祖后稷神灵所在地；向北可见那雄伟而高峻的诸毗山；向东是巍峨的恒山。黄帝平生最爱游山，尤其昆仑山。他曾经“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故司马迁说：“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

传说中的黄帝作为中国旅游文化的播种者和始祖，不仅在于探幽历险开创旅游的实践作用，而且还在于建设旅游的文化作用。也就是说，在探幽历险中他善于学习和探索，建立了华夏民族文化，是名符其实的造物主。据葛洪《抱朴子内篇》云：“黄帝曾亲自去空桐山（今河南临汝县风穴山）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又上青城山向宁封子问‘龙蹻飞行之道’。”（范成大《吴船录》）直至今日，青城山建福宫（即丈人观）里还祭祀着宁封丈人的神像。安徽黄山古时称“黟山”，因是黄帝和容成、浮丘同游讲道的地方，故取名黄山。有一

次 黄帝去恒山游玩 偶然在海边结识了名叫“白泽”的神兽。该兽能说人话 非常智慧聪明 尤其对天地间的鬼神怪物 了如指掌。于是，黄帝便令人记下白泽所说的 11520 种怪物 并绘成图 加以注释，告知其属下臣民。后来又将此博物图铸于黄帝宝鼎，指导人们的生活和旅行，是中国旅游史上最早的旅游博物图。黄帝宝鼎也成为封建社会权力的象征和庙堂神器。在青城山天谷（今玉女洞）黄帝还结识了一位爱音乐、善鼓瑟的素女（女神），并将伏羲时代的 50 弦瑟 改为 25 弦瑟 让素女弹奏 从而使“哀不自胜”的乐声和缓了许多。

在黄帝倡导下，到各地去旅行游观山水已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传统，并且还奉祭一位旅行的祖神——修。《风俗通义·祀典第八》记载 炎帝后裔“共工之子曰修 好远游 舟车所至 足迹所达，靡不穷览 故祀以为祖神”。祖者 徂也 徂者 往也；“祖神”即旅行之神。所以 古时候每当人们出外旅行 都要先祭祖神 称之为祖道或祖饯，同时还要设酒宴，给出外之人送行，求祖神保佑，一路平安。

尽管原始神话中编织的黄帝神州游踪是天方夜谭之说，十分荒诞。但透过虚构的神话，至少说明在黄帝生活的时代，一方面先民们不再满足仅能生存的生活，开始走出群居地，向远方探索。另一方面自然条件的变化、生存资源的减少，迫使他们离开久居的山林，开始新的生存奔波。这种生存奔波再不是盲目的，而是带着希望去寻找和追求新的宿营地，开始新的生活。

四、追寻芳草地之旅

远古的祖先在为生存奔波、流浪的行程中，丰富的食物、新的宿营地、美丽的原野、高峻的山峰、甘甜的流泉、宽阔的江河……或者老天发怒雷电交加，风雨霜雪气象变化，或者毒蛇猛兽、疾病流传，……都给祖先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经验教训，为进行芳草地之旅

奠定了实践基础。同时,也召唤着先民们去远征、去寻找。此外,生产水平的提高、脑思维的进化则是芳草地之旅的经济和思想基础。寻找芳草地之旅扩大和深化了生存之旅,提高了史前社会旅游或旅行的层次,丰富了旅游的内涵。

(一) 炎黄开创的部族迁徙之旅

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和蚩尤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著名的部落首领,而且是开创旅游或旅行活动的先祖。是他们率先结束无休止的生存奔波,开创部落集体迁徙之旅。

相传炎黄两帝本是同根生的兄弟部落,同是“有熊国君,少典氏之子”(《史记·五帝本纪》)。他们原先生活在大西北的昆仑山区,后来同时或先后离开山区。炎帝部落迁居陕西岐山东面,这里就是炎帝族发祥之地。黄帝迁居陕西北部,这里是黄帝族发祥之地。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原系居住在我国东部的夷人部落,他们最早进入我国中部地区,活动范围,东至海,南达安徽中部,西南达河南东南部,北到山东东南和北部。后与炎黄两部落发生争夺战争,部分九黎族南下与南方土著苗蛮部落混居,蚩尤也就成为南方苗蛮的祖先。

炎黄两部落在东迁陕西定居的过程中,生产也由游牧发展为从事农业生产,开始驯养家畜,种植作物。此后,他们开始向外发展,寻找平坦的芳草地。炎帝部落从陕西南部沿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向东,抵达河南西南和山东地区。炎帝姜姓,号神农氏。黄帝从陕西北部东迁,沿北洛水南下至陕西大荔朝邑县,便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和太行山边,又向东北迁徙,抵达今山西省南部黄河之滨,最后定居于河北涿鹿附近。黄帝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统率姬、西、祁、己、滕、箴、任、荀、僖、儁、姁、依等 12 个氏族或胞族。他和炎帝是父系氏族社会最强大的部落首领,也是氏族迁徙的开创者、颇具开拓精神的旅行代表。他们不甘父系氏族社会低下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决心告别发祥之地,远涉他

乡，去寻找和争夺美丽富饶的芳草地，于是，形成了中国旅游史上以寻找和争夺芳草地为目的，以氏族集体迁徙为形式的原始社会的旅行活动。

炎黄两部落进入我国中部地区时，与先行来到的九黎族发生冲突，展开长期的斗争。先是九黎族获得胜利，炎帝族被迫逃往涿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败逃至山东盐池，终被黄帝身首分离，故该地名解县，盐池又名解池。九黎族一部分留居中原，加入炎黄族，另一部分则南下荆楚之地，与苗蛮混居，于是蚩尤也被苗蛮认作祖先。涿鹿之战后不久，炎帝与黄帝之间又发生冲突，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大战三次，炎帝失败，诸部落“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从此炎黄两族与部分九黎族（即夷族）融合一体，定居中原，共同开发黄河中下游中原大地，建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并使这里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炎黄部族经过二次寻找芳草地的部族迁徙旅行，把活动舞台从山区搬往平原，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建设，成为经济、文化发达的强大部落。这里原本农畜牧业就较发达，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农业定居为主的生活，炎黄部族的到来，使之更加发达。但是在原始社会，农业定居决非稳定性的结构，其表现为部族频繁迁徙。造成迁徙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刀耕火种”低下的生产水平、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一切都促使部族背井离乡，弃旧图新，四处迁徙，寻找美丽肥沃的陌生荒原重建家园。同时，超越采集和狩猎经济的原始农业经济又促使人口增长、部族壮大，迫使他们谋求远方宽广的农业新定居点，成为部族频繁迁徙的新因素。此外，土地的需要和财富积累而引爆的部族之间或部族联盟之间掠夺性战争，导致失败部族远走他乡。

因此，农业定居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为部族迁徙之旅打下了基础；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不断增长和掠夺性战争，又是部